

苏精 辑著

《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

林则徐 看见的世界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苏精 辑著

林则徐 看见的世界

《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LIN ZEXU KANJIAN DE SHIJIE

林则徐看见的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 /
苏精辑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0
(2018.3 重印)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495-9997-4

I. ①林… II. ①苏… III. ①报刊—翻译—中国—
1839-1840 IV. ①G219.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30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村黄花工业园 3 号 邮政编码: 410137)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1/16

印张: 34.25 字数: 538 千字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1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序

周振鹤

虽然史料不是史学，但无史料却成就不了史学。一切以论代史的著作自然遭人鄙弃，即使以论带史的思路也依然不是一条正确的治史途径。一切能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但通常，史实的追求是很不容易的。历史研究者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为歪曲了的史实所导引，进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但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时并不都是历史研究者主观的错误，而可能是客观上的原因。就像看戏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台前的表演，看不到幕后的化装，我们只注意于主角的活动，而忽视配角甚至龙套的表现。即使我们很注意所有角色的表演，但我们总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真实，而未意识到这原是在导演说戏之下的表演，说白了，他们是在做给摄影机拍摄的，而不是给观众表演的。即使戏剧是直接演给观众看的，但依然有两派表演理论的冲突，一派是本色的，一派是表演的。历史现象的发生有时也往往如此，我们只注意到各色历史人物的台前的表演，看不到他们在幕后的举止，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真面目，而是舞台限制了我们。因此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于搜集台前之外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政治军事外交以外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式使节会谈之外的私人交往与接触，典籍公文记载以外的私人信函日记，冠冕堂皇演说背后的流言蜚语，只要有助于历史真相的披露，就无一不是可用的史料，就无一不可以用来使历史显露其本来的真相。本丛书所要展示的正是这一目的，以稀见的，但又不失为关键的史料的披露为范围，不论文献的语种，但以外文为主要对象。这些文献或以手稿形式存在，或虽已出版而被查禁，或未被查禁但却流传不广，或在外部世界虽有流传，而国人却少有所闻，尽量为之

网罗。然主编者与出版社囿于所闻，见识未广，亟希望史学界内外有同好者加以推荐或自荐，以使本丛书能够臻于充实，至于有用，则编者幸甚，读者幸甚。

晚清历史之重要中外于今已有共识，身在其中之人，已深感其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在今天之人或曰没有晚清哪来五四，或曰晚清乃中国现代化的准备期。然虽晚清去今未远，而资料之丧失或未曾开发者仍为数甚多。或者因当事者有所忌讳，不欲公刊；或者因有关当局以利益关系，一开始就被列为禁书；或者当时未显其为要闻，而在后世今日看来乃是解决历史疑案之锁钥。所有这些都应该尽量发掘，刊布于世，既充实史料之大库，复使历史真相更趋于明晰，甚或改变原来的历史定论。本社前已出版两种相关的丛书，一是《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一是《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目的都是为了使历史的面貌更加丰满真实。本丛书则更为直接，采用的尽量是未曾加工或相对原始或基础的史料，其于历史研究的作用恐怕对比以上两种丛书有过之而无不及。首批推出的两种材料都是法文原版，一是加略利有关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日记，一是伯希和进入敦煌藏经洞的笔记。加略利恐怕一般人不大晓得，但他却以译员的身份掌握了中法谈判的最机密的材料，所以他关于此次谈判的日记甫一出版就被禁行，为的是避免泄漏法国侵略外交的核心机密，所以此日记存世者不过十部而已。今天的读者自然会批判性地进行阅读，以为了解彼段历史的参考，复对其中的关键人物如耆英有中文资料以外的新认识。至于伯希和，虽然在中国是无人不识，但他的敦煌藏经洞笔记却在生前从来没有准备刊行。原因不言自明，他不愿被人看成是小偷强盗。而即使是在给自己备忘的笔记中，他也留了一手，始终不透露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一百年后的2008年，这本笔记的原版通过掌握不同语种的三位人士的努力才得以整理印行法文版，如果不加以汉译，相信许多读者是难以一亲其芳泽的。另外，他于义和团运动时正在北京公干，也留下一本分量不大的日记，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这三种书是首批要给大家介绍的。类似的外文著述为数不少，我们希望能够一部一部推荐给大家，步子不会快，但希望能一直走下去。是为序。

自序

林则徐主持翻译的《澳门新闻纸》和《华事夷言》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性译作，历来关于这两种文献的研究论著很多。不过，很特别的是，这两者的英文原本一直隐晦不明，也因而局限了研究的成果。如今我竟得以将这两种底本一举搜齐还原，并与译文并列公诸于世，实在是出于偶然的机缘，而终于成则是幸运所致。

2004年前后，我正撰写《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一书，包含为马礼逊施洗过的四名华人基督徒各撰一文，其中之一是《林则徐的翻译梁进德》，为此我略微涉猎了《澳门新闻纸》和《华事夷言》等文献，也晓得了这两种文献的底本不为人知的事。正巧我在检读《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和《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两种英文报时，无意间发觉其中一二则新闻正是《澳门新闻纸》的内容，于是隐隐感到这似乎有可为之处，便在自己以传教士为主轴的研究之外，利用一部分时间，先熟读了《澳门新闻纸》的译文，接着仔细阅览《广州纪事报》和《广州新闻报》，试图在大海中捞针找出中文译本和英文报纸对应的内容，结果《澳门新闻纸》和《华事夷言》的出处，竟然就在这种相当笨拙的寻寻觅觅下，一点一滴逐渐对照显现了出来。至于《澳门新闻纸》内容出自《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的部分，承新加坡的好友庄钦永博士协助我购得该报的缩微胶卷，再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先后费了四年功夫，终于在2008年全部还原了《澳门新闻纸》和《华事夷言》的底本。

译本与底本搜集齐全了，我却接连撰写《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和《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两本书稿，一时无法分心整理《澳门新闻纸》和《华事夷言》的底本，只能将这些始于偶然而成于幸运的史料暂且束诸高阁。直到2013年底我写完《铸以代刻》的书稿后，整理凌乱堆积的书架，又翻出了尘封淡忘的这些史料，摩挲浏览之余，觉得以往

世人关于《澳门新闻纸》和《华事夷言》的误会、猜测和根本不知的一些问题，很可能由于英文底本的还原而获得解决或纠正，从而有助于林则徐和魏源、翻译史、新闻史、中外关系史、汉语新词等领域的研究，因此有意整理公开出版这些史料，有些同道也鼓励我进行此事。

意外的是我在整理后却发觉中译本有不少的问题，和前人一致推崇称赞《澳门新闻纸》和《华事夷言》的说法有明显差异。这难免让我心生犹豫，唯恐贸然出版后，不仅我可能遭人批评标新立异，不尊重林则徐等历史人物，也不尊重学术前辈的研究成果，甚至连累出版社也被批评波及；况且除我自己以外，所有鼓励我的同道、主编与出版社都不曾见过英文底本的内容，因此这些史料究竟是否值得出版也待进一步确定。几经考虑，我决定先自费试印一百部，分请前辈同道指教，如果确系有相当价值的史料，再寻求出版社出书传播的机会。

我要感谢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大力协助的两位资深图书馆专家。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组主任黄淑薇女士，给我阅览该馆资料的诸多方便。另一位是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徐忆农女士，热忱代我联系并亲自接待，我才有幸在南京图书馆目睹很可能是世间孤本的《澳门新闻纸》抄校本，并且校阅一过，也因此完成编纂本书最后一项必要的工作，我衷心感谢她们。

我也要谢谢鼎力相助编辑出版本书的严嘉云小姐和提供一些重要史料让我顺利撰写导论的刘毓欣小姐。

蘇精

2015年6月17日于台北斯福斋

目 录

自序.....	i
---------	---

壹、《澳门新闻纸》.....	1
----------------	---

 导论：《澳门新闻纸》的版本、底本、译者与翻译 / 3

 《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

 第一册 第 1 - 23 则 / 51

 第二册 第 24 - 44 则 / 107

 第三册 第 45 - 81 则 / 159

 第四册 第 82 - 114 则 / 273

 第五册 第 115 - 152 则 / 351

 第六册 第 153 - 177 则 / 421

贰、《华事夷言》.....	489
---------------	-----

 《华事夷言》的底本与翻译 / 491

 《华事夷言》的原文与译文 / 504

壹
澳门新闻纸





导论

《澳门新闻纸》的版本、底本、译者与翻译^{*}

绪言

从1839年至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抗英期间，主持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¹。这项翻译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就当时英文报纸内容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很满意《澳门新闻纸》的实效，认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御准备之方，多由此出”²。因此他除了自己利用《澳门新闻纸》，也抄送广东同僚与他省督抚官员参阅³，还将部分内容附折奏呈道光皇帝御览⁴。

在中外激烈冲撞之际产生的这部英文中译作品，是出于钦差大臣主动而为的结果，象征唯我独尊的天朝中国终于开始探索与了解世界了，因此是历史意涵极为丰富的文献，也成为近代中国翻译史、新闻史、中外关系史及鸦片战争等研究的重要论题。不过，林则徐自用的和抄送其他官员的《澳门

^{*} 本文第一部分“《澳门新闻纸》的版本”内容，以《南京图书馆藏〈澳门新闻纸〉考订》的篇名，刊登于南京图书馆编印之《新世纪图书馆》2015年第4期（总第224期），页82-85。又，本文全文以《〈澳门新闻纸〉的版本、底本、译者与翻译》的篇名，刊登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办之《翻译史研究》第5辑（2015.12），页99-144。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2册，页29-30，“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情形片”。

2 魏源：《海国图志》（古微堂，1844），卷48，《筹海总论》下，叶24-31，“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第六条：“夷情叵测，宜周密探报也。”

3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7册，页171，“致豫堃”，道光十九年（1839）3、4月于虎门；页187，“致怡良”，道光十九年12月14日于广州；页191，“致怡良”，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30日于广州；页213，“致怡良”，道光二十年6月初于广州。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页29-30，“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情形片”。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页289-294，“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情形片（附抄译信六）”。

新闻纸》，迄今都没有再现人间，研究者大多依据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抄校本的重排本或缩印本进行论述⁵，更严重的是几乎无人见过《澳门新闻纸》的英文底本，因此无从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这部中国人所为的初期英文中译作品。本文经查阅1839与1840这两年相关的英文报纸，并全部还原出南京图书馆所藏《澳门新闻纸》的英文底本后，据以就版本、底本、译者及其翻译等四个面向讨论这部历史性的作品⁶。

壹、《澳门新闻纸》的版本

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澳门新闻纸》抄校本，是此书已知存世的孤本，具有独特珍贵的史料价值，因此应该先探究这部抄校本的来历与递藏经过、其内容的完整性与批注文字的作者，以及与《澳门月报》的关系和差异等问题。

一、版本与收藏历程

这部抄校本的封面无题签，书中夹签题名《澳门新闻纸摘抄》，内文则题为“几月几日澳门新闻纸”或“澳门几年几月几日新闻纸”，或只题为“澳门新闻纸”等等，写法不一。书共六册，线装，高25.4厘米、宽15.1厘米。本书抄于毛泰纸上⁷，未编叶次，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字，遇皇帝、钦差、天朝、奉旨等抬头。全书校改处不少，抄手不只一人，以墨笔抄写；校者朱笔，或直接改在字面上，或在字旁行间。书中藏印有“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及“南京图书馆藏”两方阳文朱印。

南京图书馆这部《澳门新闻纸》并非林则徐自用或当时抄送其他官员

5 重排本如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第2册，页365-522，“澳门新闻纸”；缩印本如南京图书馆编《澳门问题史料集》（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上册，页3-194，“澳门新闻纸”，每页含原书两叶或四叶。

6 南京图书馆藏《澳门新闻纸》的内容，每则虽注有底本的中西历年月日，但未编号，引用说明时相当不便，而且有几则的年月日混淆错误，笔者经考订后予以编号，本文引用时只提第几则，请读者对照本书《澳门新闻纸》的各则编号查检。

7 此项用纸为2014年9月20日笔者在南京图书馆阅览本书时，承该馆退休馆员沈燮元先生指教。

的本子之一，而是后来的抄校本，因为书后有藏书家邓邦述记于丁巳年（民国六年，1917）正月的三篇跋文，但并非邓氏亲笔，而是和内文抄手相同的笔迹，可知跋文为过录，再按邓氏于1930年刻印其《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收录有《澳门新闻纸》的跋文，所记年份也和抄校本同样是丁巳年⁸，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部《澳门新闻纸》为1917年或以后的抄校本。

关于这部《澳门新闻纸》抄校本的来历，研究者向来都说是邓邦述的收藏本，有人更进一步认为是邓邦述的曾祖父、林则徐在广东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家传本，也就是当时林则徐抄送邓廷桢的本子。⁹这两种说法都有疑问。先就所谓邓氏家传本而言，邓邦述在跋文中说：“余收此书，亦以与余家有关耳。”¹⁰这已清楚表示此书为邓邦述自己收购度藏，若是其曾祖父递藏下来的家传本，邓邦述不可能会写出这样的文字和语气。

其次，南京图书馆这部《澳门新闻纸》是否邓邦述本人的收藏本？他以三天的功夫为此书各写一篇跋文，显示非常珍重这部和先人有关的书，但书上并没有他的藏书印记，这和一般藏书家的做法不同，已经不寻常；更可疑的是，其跋文有如上述为抄手过录而非亲笔，而且文中有八个分别以朱笔和墨笔涂点校改的错字讹笔，其中“吏”“亚”两字甚至留白，再由校者以朱笔填上。若是邓邦述收藏之本，则他是传统读书人出身的进士、翰林，又是清末民初有数的大藏书家，对于涉及先人的文献没有亲笔题跋，还让人将自己的跋文抄录校改成这副模样，也没有重新誊写，这种情形实在过于不合理，因此这部抄校本很有可能不是邓邦述的藏本，而是他人就其藏本抄校而成的。但是，如此则邓邦述的原藏本何处去是个疑问，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年间，因为生计缘故而陆续出售藏书，《澳门新闻纸》并不在两次大举

8 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台北：广文书局，1967，影印本），《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卷4，叶9，“澳门新闻纸”。

9 陈胜彝：《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珍贵记录——林氏〈洋事杂录〉评介》，《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页1-14；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页264-277。

10 南京图书馆藏《澳门新闻纸》校抄本，第6册，邓邦述跋；南京图书馆编《澳门问题史料集》，上册，页194；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卷4，叶9，“澳门新闻纸”。

邓氏《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中的《澳门新闻纸》跋文，全文文字较南京图书馆校抄本跋文更动颇多，但此处“余收此书，亦以与余家有关耳”则相同。

售书之内¹¹，以致下落不明，难以追踪。

南京图书馆这部抄校本不论是否邓邦述原藏，因书中有“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印记，而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的名称存在期间为1919年至1927年¹²，再对照前文所述邓邦述跋文作于1917年，则这部《澳门新闻纸》应是1917年以后传抄，而于1919年至1927年之间入藏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再递藏于南京图书馆至今。

二、内容与批注的考辨

由于林则徐当年的《澳门新闻纸》本子都已存亡难卜，南京图书馆这部可能是人间孤本的抄校本就极为珍贵重要。不过，这部抄校本是否包含了当年林则徐的译者翻译的全部内容？这部抄校本的夹签题名为《澳门新闻纸摘抄》，“摘抄”两字很引人注目，图书馆的编目人员是否有见于内文出自不同报纸，详略不一，日期又不连贯，所以如此题名，或者另有所据，已无从知道。但是，下文所述却可以解答这部抄校本是否包含当年译报所有内容的疑问：

第一，1840年1月25日的英文《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刊登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义律 (Charles Elliot) 与葡澳总督宾多 (A. A. da Silveira Pinto) 的两封往来书信；同年2月8日的《广州新闻报》又刊登英国海军炮舰“窝拉疑号” (the Volage) 指挥官士密 (H. Smith) 与宾多往来的七封信及两项文件。这些信件经林则徐的译者翻译后，林则徐先和广东巡抚怡良商量是否将其中六封信奏上道光皇帝¹³，随后决定作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一折的附件抄呈御览¹⁴。由此可见林则徐的译者至少译出六封信，但是在《澳门

11 邓氏藏书于1927年与1940年两度大批售于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图书馆。关于邓邦述的藏书与售书，参见《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寒瘦山房藏存善本书目七卷》，《序》；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北京：中华书局，2009增订本），《邓邦述群碧楼》。

12 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原为1908年创立的江南图书馆，屡经更名，至1919年改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至1927年再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此后又几度更名，最终并入南京图书馆。

13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7册，页196，第243号，“致怡良”。

14 《林则徐全集》，第3册，页289-294，第737号，“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片（附

新闻纸》中只收录了2月8日《广州新闻报》所刊七封信中的两封而已¹⁵。

第二，1840年6月20日《广州新闻报》刊登该报主编的评论，表示在上星期取得林则徐的译者所译一些该报内容的中文译本，包含5月30日报道的海盗攻击“希尔拉士号”船(the Hellas)、5月2日刊登的一篇读者来函，以及一些主编没有指明的该报内容等等¹⁶；结果《澳门新闻纸》的确收录了“希尔拉士号”被袭事件¹⁷，但是那篇读者来函(描述一位中国官员拜访一名西人的经过)却不见了踪影。

以上这两件事足以说明，《澳门新闻纸》抄校本的篇幅虽然约十万三千字有余，并未包含当时译报的全部内容。但这究竟是这部抄校本漏抄未收，或者林则徐当年的《澳门新闻纸》就没有收入译报的全部内容，已经难以查知。不论如何，这部抄校本的确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澳门新闻纸》唯一可以依据的文本。

在《澳门新闻纸》抄校本中，有十一则内容之后附有批注文字，研究者向来都说这些批注出于林则徐之手。由于《澳门新闻纸》本来就为林则徐而译，此说自然言之成理。但是，仔细阅读这些批注后，至少有两则的文字值得商榷：第112则(1840年4月25日)与第148则(1840年7月25日)。第112则谓谣传林则徐有意拆除广州城外房屋，以保障城池，批注：“何不筑外郭将关厢民居圈围在内？”广州是大城，要兴建能圈围关厢居民又有防御功能的外郭是何等大事，此种质疑语气不似正在广州城内主持大局的当事人林则徐所说，却像是事不关己的第三者读后感，尤其是《澳门新闻纸》抄校本中此句文字的笔迹，和第112则以及此本所有文字的抄手与校者的书法完全不同，因此这应该是抄校本完成后，自以为旁观者清的某位读者加上的批语。

至于第148则批注，是在论述俄国在中亚地区积极与英国争霸的各种作为后，进一步在地图上研讨从比特革(俄国京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到印度的走法。很重要的是，批注者说自己“按着《地理志》之图，并夷字大

抄译信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页29-30，“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情形片”。

15 即《澳门新闻纸》第82则收录的两封信。

16 *The Canton Press*, 30 May 1840.

17 即《澳门新闻纸》第122则(1840年5月30日)。

图参考”，他根据的《地理志》应该就是《四洲志》底本慕瑞 (Hugh Murray) 的《地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¹⁸，并且加上英文 (夷字) 地图作为参考，因此这则批注肯定不是出于林则徐之手，而是负责翻译的梁进德译完后，进一步补充说明译文的内容，再一并送呈林则徐阅览的。和此则类似的情形是第37则 (1839年11月2日)，在关于船只保险广告的译文之后，很有可能是为了让林则徐更为了解起见，补充了一位名为“安平”的人说明西方船险的做法，补充的文字还远多于译文本身。

三、和《澳门月报》的关系与差异

考订《澳门新闻纸》，不能不涉及魏源《海国图志》书中的《澳门月报》，因为《澳门月报》总共五十四段文字，包含论中国、茶叶、禁烟、用兵、各国夷情等五个主题，全部都出自《澳门新闻纸》的内容。既然如此，动手选择与编辑《澳门月报》的人会是谁呢？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说是林则徐。¹⁹ 但是，道光二十四年 (1844) 魏源排印的《海国图志》，卷四十九“附录”的卷首“夷情备采”标题下方，清楚标注有“原无，今补辑”五个小字，这显然是魏源自己表示在排印《海国图志》时，从林则徐给他的《澳门新闻纸》中选择部分内容，编成《澳门月报》作为《海国图志》的附录。此种情形正和同在此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一样，本来是称为《华事夷言》，到了魏源排印时加以编辑，大量删减了内容并加上“录要”两字²⁰。

《澳门月报》的五十四段文字出自《澳门新闻纸》的六十九则内容，其中有十四段文字是就《澳门新闻纸》两则以上的内容重组合并而成，甚至论禁烟的第五段与第十三段，都是各撷取《澳门新闻纸》五则内容的片段拼凑

18 Hugh Murray, *The 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 Phila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 1837(?). 3 vols.

19 例如陈原《林则徐译书》，《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第7版；齐思和《鸦片战争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页464；以及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等等。

20 参见本书“貳、《华事夷言》”，“《华事夷言》的底本与翻译”。

而成。²¹同时，魏源在编辑《澳门月报》的过程中又予以删减、修改、重组、挪动、增添等等加工手段，导致《澳门月报》的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国人政治立场与民族意识，和所从出的《澳门新闻纸》有所差别；而《澳门新闻纸》的许多译文和英文报纸原文已有不少歧异与错误，再经过魏源加工编辑而成的《澳门月报》，和英文报纸原貌与内涵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以下两例足以说明这种现象：

第一是《澳门新闻纸》第18则（1839年9月14日）与对应的《澳门月报》论用兵第五段文字，内容是中国人在海上围攻并烧毁西班牙船“墨尔咿那号”（the Bilbaino）的事。《澳门新闻纸》的译文虽然有些错误和省略，大致没有偏离底本《广州新闻报》的原文；到了魏源编辑《澳门月报》时，不仅全部删除《澳门新闻纸》中解释“墨尔咿那”船无辜受害的说法，以及中国人苛待被俘西班牙船员的内容，还进一步添加该船是鸦片趸船的文字，并指称“此趸船被逐未回国者”，意图坐实该船违法在先，被烧毁是咎由自取。

第二是《澳门新闻纸》第122则（1840年5月30日）与对应的《澳门月报》论用兵第十一段文字，内容是中国船只围攻“希尔拉士号”的经过。《澳门新闻纸》的译文虽然直白不文，也有些错误和省略，但仍可算是接近《广州新闻报》报道的原文；而魏源编辑的《澳门月报》记载双方的战斗，完全省略中方兵士的大量伤亡，只描述对方受伤惨重，等等。

对以上这两次战事的描述，《澳门新闻纸》的译者文字比较芜杂，但显然尽力对应于原文；而《澳门月报》的文字较为简练雅驯，只因编辑者魏源有预设的立场，《澳门月报》呈现的是不同的战况与结果。尽管魏源这么做或是出于用心良苦，却已使得《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的史料价值高下有别，而《澳门新闻纸》全书的译文虽然经常出错，问题也不少，但是至少在翻译这两次海战报道的态度是客观可取的。

21 第五段撷取《澳门新闻纸》第12、14、15、19与39等五则的内容片段拼凑而成，第十三段则是撷取第39、66、72、125与127等五则的内容片段拼凑而成。